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信仰危机与苏联的命运

STUDIES ON THE BELIEF CRISIS AND DESTINY
OF THE SOVIET UNION

□ 蔡文鹏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研究系列 46

信仰危机与苏联的命运

STUDIES ON THE BELIEF CRISIS AND DESTINY
OF THE SOVIET UNION

□ 蔡文鹏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仰危机与苏联的命运/蔡文鹏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1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研究系列)

ISBN 978-7-5097-2778-2

I. ①信… II. ①蔡… III. ①政治-研究-苏联 IV. ①D7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2391 号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研究系列 46

信仰危机与苏联的命运

著 者 / 蔡文鹏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刘 娟 汪明慧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 / 李有江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6

版 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字 数 / 274 千字

印 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2778-2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 ·

本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编

目 录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研究系列 46

第一章 导论	1
一 问题的提出	1
二 相关研究综述	7
三 相关概念的界定	15
四 研究思路与框架	24
五 研究方法	26
第二章 赫鲁晓夫时期：信仰危机的产生	30
一 引论：赫鲁晓夫执政前苏联人的信仰状况	30
二 信仰危机产生的导因	33
三 苏联人信仰危机的显现	56
四 本章小结	73
第三章 勃列日涅夫时期：信仰危机的深化	78
一 信仰危机深化的主要因素	78
二 苏联人信仰危机的深化	93
三 本章小结	125

第四章 戈尔巴乔夫时期：信仰危机全面爆发与苏联解体	129
一 信仰危机全面爆发的主要因素	129
二 信仰危机的全面爆发	167
三 信仰危机的恶性化发展与苏联的解体	187
第五章 结论与启示	198
一 研究结论	198
二 启示	209
参考文献	224

第一章

导 论

20 世纪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光荣与梦想交织的世纪，一个胜利与挫折并存的世纪，一个希望与忧患比肩的世纪，一个自豪与痛苦混杂的世纪。其中，苏联^①从诞生到解体的命运，无疑是那个世纪一个最为经典的注解。苏共拥有近 20 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近 200 万党员时击败了希特勒，而到拥有近 2000 万党员时却丧失了政权；作为一个历经 74 个春秋、拥有 2240 万平方公里土地、2.9 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竟于 1991 年底在没有外部侵略的威胁，没有内战，没有暴风骤雨般群众运动的情况下，悄悄地实现了政权更替。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戏剧性、悲剧性的巨变，许多人感到震惊、疑惑，西方人将此形容为一次“天鹅绒般的革命”（Velvet Revolution），更多的国内外学者将此称为 20 世纪最大的“历史之谜”。

一 问题的提出

唯物史观认为，任何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都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层面“合力”作用的结果。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错综复杂，既有外因，也有内因；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既有现实原因，也有历史原因；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以及理论、思想、外交、民族、社会等各方面的因素。近十五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此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其中探讨比较集中的有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民族危机、国际危机等，但是立足于信仰危机角度的尚不多见。

^① 本书为避免用词的混乱，将 1991 年 12 月 26 日作为一个基本分期，此日期之前通称为“苏联”，而不使用“原苏联”、“前苏联”等，此日期之后通称为“俄罗斯”，而不使用“后苏联”等。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拥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精神支柱并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至关重要。可以说，苏联的产生与存续，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密不可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新纪元。这一过程本身首先是俄国革命知识分子把共产主义信仰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并得到人们的信奉与认同，应用于俄国实际的结果。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为马克思主义信仰占据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后盾和坚实的制度保障。此后七十余年间，为了帮助人们树立和巩固共产主义信仰，苏联在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方面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比如建立了拥有数十万宣传员和鼓动员、学者和教师、作家和记者等的庞大系统，使马克思主义成为苏联人共同相信的真理。正如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所言：“共产主义者否认存在上帝，但他们至少为其人民提供了某种东西去信仰——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成千上万的人抱有这一信仰。”^① 这种信仰并不是空的，它拥有强大的感召力、导向力、凝聚力和推动力，是团结苏联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柱。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是苏联人万众一心，在苏共领导下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的法宝。如果说国家机器是维持苏联存在的“硬件”，那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就是维持这个国家的“软件”。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六年，苏联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发生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变化。首先，对于戈尔巴乔夫的个人信仰而言，不仅仅是苏共普通党员、干部、一般群众感到迷惑，即使是曾身处苏共中央领导集团的领导人都觉得是“谜”。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戈尔巴乔夫办公室主任瓦列里·博尔金提出：“为什么后来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对此还没有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他的思想何时发生变化的也是一个谜。”同时他期待，“历史学家终将弄明白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是在什么时候以及怎样发生了如此急剧的变化。究竟是什么使得他从宣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转为赞扬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呢？”^② 其次，对于苏共党政要员群体的信仰状况而言，1991年6月的调查数据显示：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信仰，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

① [美] 理查德·尼克松：《超越和平》，范建民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第14～15页。

② [俄] 瓦列里·博尔金：《震撼世界的十年——苏联解体与戈尔巴乔夫》，甄西主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8，第90、91页。

的社会主义制度；12.3%的人具有民主主义观点，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①。为什么长期接受共产主义信仰教育的苏联党政干部，竟有相当数量的人抛弃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从而倾向于资本主义，最终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除此之外，国内外相关研究和现实表明，苏联解体前夕出现了涵盖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遍及社会各阶层的众多信仰迷失者，人们的信仰出现了严重的全局性危机，否则众多国民（包括1500多万名苏共党员）绝不会面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而冷眼旁观。俄罗斯政论家谢尔盖·卡拉·穆尔扎认为，“由于种种神秘不解的原因，在俄罗斯工人群众之间，酝酿成熟了一种信念，认为摧毁苏维埃制度并放弃与苏共团结一致将对人们有利。人们为什么会这么想？——这是一个千古之谜。”同时，他抱怨将近三亿苏联人在联盟崩溃的历史时刻“像盲人一样，蹒跚地走向深渊”^②。基于上述因素，江泽民曾指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外，执政党内和群众中发生思想变化、思想混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③因而，从苏联人的信仰问题入手，是破解此“千古之谜”的一个重要思路。

从理论上讲，信仰危机一般体现在社会理想信仰和个人人生信仰的危机两个层面：从宏观层次上即在某个历史时期、历史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信仰能否成为社会的主导信仰；从微观层次上即某些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其个人信仰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过程。由此，需要探讨和研究的问题是：苏联人信仰危机的产生、深化以至全面爆发的历史过程是怎样的？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是错综复杂的，但其主导因素是苏共上层指导思想的变化，那么哪些方面是致命的思想理论因素？这方面惨痛的教训对社会主义国家有何启示？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作出回答，也是本书所试图探讨的课题。

毋庸赘言，厘清信仰危机与苏联的命运关系问题，从中汲取历史教训，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搞好信仰教育，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凝聚力、战斗力、向心力，提高共产党的执政水平，巩固执政地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等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现实意义。

① [美] 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容湘、孟鸣歧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151～152页。

② 1994年7月16日《苏维埃俄罗斯报》。转引自〔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俄罗斯向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徐葵、张达楠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第149页。

③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第125页。

从信仰危机的视角探析苏联走向解体命运的原因，在理论上提供了一个比较可行而且重要的思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发展观绝不是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它同时还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重要的反作用。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家重要的思想政治工具。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表明，意识形态的崩溃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崩溃的先兆，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信仰居于意识形态的最高层，超越精神领域各个具体因素、特殊行为及其功能之总和，信仰的转变是根本性的变化。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除了要有一定的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之外，更需要共同的信仰构筑和维系。信仰通过自身所具有的能动性作用于社会，表现出文化创新价值、经济激励价值和政治凝聚价值等，成为社会变革、政治变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强相关关系。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指出，“不难理解，一个社会要是没有信仰，就不会欣欣向荣；甚至可以说，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①因为没有共同的思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为了使社会成立，尤其是为了使社会稳定，就必须用某种思想把全体民众的意识凝聚和统一起来，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认为：最重要的是，国家力量存在于其国家本身，即“存在于他们的技术、能力、雄心、纪律、创造性中；存在于他们的信念、神话及其幻想中”^②。但是，信仰并不是一种僵死的精神现象，信仰要运作、发展和展示巨大的社会功能，信仰危机也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现象。审视阶级社会以来的人类历史，每一个历史时代的发展都是以批判和反思传统价值目标、传统信仰作为契机和动力的，通过扬弃旧的价值目标，动摇传统的旧信仰，开拓和建立起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目标、新信仰。这样必然导致人们新旧价值观念、价值目标、信仰的冲突与激荡，使得人们的传统信念、精神支柱，发生了动摇，而新的信仰、精神支柱又尚未确定，于是便会出现信仰危机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史大量地表现为各种思想意识斗争的历史，是各个阶级竞相进行信仰斗争与教育的历史。著名历史哲学家汤因比认为不同文明形态更替期间会出现“灵魂的分裂”现象，这种“灵魂的分裂”实际上即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信仰危机”。世界著名诗人歌德这样论述信仰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世界历史的唯一真正的主题是信仰与不信

① [法]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沈阳，沈阳出版社，1999，第567页。

② [美]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王保存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第245～246页。

仰的冲突。所有信仰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对当代人和后代人都是光辉灿烂、意气风发和硕果累累的，不管这信仰采取什么形式；另一方面，所有不信仰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也不管这不信仰是什么形式），都只得到一点微弱的成就，即使它也暂时地夸耀一种虚假的光荣，这种光荣也会飞快地逝去，因为没有人操心去取得一种对不信仰的东西的知识。”^① 应当说，虽然这种以知识代替信仰的观点有失偏颇，但是作为文学家的歌德运用夸张的语言来表达他对宗教的炽热情感，充分肯定了人们需要信仰的重要性，肯定了信仰在社会中的巨大作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马克·布莱斯通过对美国、瑞典等西方国家的考察，提出了五个假设：作为制度变化产物的信仰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可以作为实现联盟的基础；可以赋权于一些机构和个人挑战现有的制度；可以帮助形成新的制度；并最终结合大家的期望值稳固新的制度。^②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论证了信仰与利益权衡、制度变化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相互作用。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史以来最为壮丽的人类解放事业，这样一个空前广泛和深入的社会运动，必然会遭到比以往更巨大的阻碍和困难，如果没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巨大作用，它的不断发展和不断胜利是无法想象的。因为社会主义事业是集体的事业、群众的事业，是不能单凭英雄的个人或一个小团体来从事和完成的，而必须唤起民众。唤起民众就必须把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奋斗。而要团结，最根本的是要有共同的信仰。诚如邓小平所言：“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因此，“在军队里要讲信念，在人民中间、在青年中间，也要讲信念”^③。这是对意识形态内部机制和外部作用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提炼，指出共产主义信仰实践中突出表现出来的政治导向、稳定与凝聚价值，更表明了共产主义信仰在社会主义国家占有无可替代的地位。而放弃、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事业就要遭受挫折，苏联的解体从反面证明这一点。因此，考察信仰危机与苏联解体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信仰危机的视角探析苏联走向解体命运的原因、教训，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亦是不言而喻的。苏共、苏联与我党、我国有着不少的历史渊源，苏

① 歌德：《东西集·注释》，转引自《伦理学体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363页。

② Mark Blyth, *Great Transformations: Economic Idea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5.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190、191页。

共、苏联曾存在的许多问题，在我党、我国也曾存在过。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研究员克洛茨沃哥曾表示：莫斯科是北京的一面镜子，中国应该从俄罗斯改革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中国过去在十月革命后“以俄为师”，那时俄罗斯是胜利者，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中国同志仍要“以俄为师”，只是这次俄罗斯不是胜利者，而是失败者。俄罗斯改革的失败，使俄罗斯人民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中国同志可以不付任何代价，就能从俄罗斯改革的失败中免费学到很多东西。^① 对于我国的“信仰危机”问题，如果从阶段上作一粗略的划分，此方面的三次集中讨论主要是在“文革”结束后^②、1989年前后以及1999年前后进行的。改革开放以后，在更为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出现了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分配方式、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出现了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样性。在此背景中，一部分党员、干部和群众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信仰模糊、信念动摇、信心不足、信任下降等现象，现实表现为思想混乱、精神空虚，容易被错误思潮和歪理邪说所迷惑、困扰、俘虏等。在错综复杂的因素中，苏联解体无疑是一部分人信仰危机产生、蔓延的一个重要诱因。以近年来惩处的腐败分子为例，原中共合川县委副书记高万成坦言：“1991年岁末，苏联解体，使我的信仰发生了大裂变。我想，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顶住，变不变也很难说呀！……于是，我使用手中余权大捞钱。”^③ 原河北省办公厅副主任、省国税局局长李真被实施“两规”后曾唉声叹气地说：“生和死原本离得这么近，近得只有一线之隔，而架着这条线的就是信念。”“苏联解体后，我就错误地认为，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物皆空，像苏联解体后，有些高官为养家糊口，去看大门、卖馅饼，不如权力在握之时及早做些经济准备，以防万无一失。”^④ 正如2000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言：“为什么苏联这样一个发展了七十年的社会主义国家还会解体呢？一些善良的人们产生了这样那样的疑问和困惑，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忧虑，甚至我们的一些党

① 转引自吴易风《当前经济理论界的意见分歧》，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第208页。

② 1980年2月，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有一种说法：我们的国家出现了危机，一个叫信仰危机，一个叫信心危机，一个叫信任危机。”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354页。据笔者所了解的资料，这是“文革”以后，中央领导人较早直言“信仰危机”问题。

③ 邵道生：《哪些人存在“信仰危机”》，检察日报正义网，2001年4月4日，<http://www.jcrb.com.cn/ournews/asp/readNews.asp?id=30227>。

④ 乔云华、张洪河：《腐败之路 死亡之路——访李真专案组副组长侯磊》，新华社11月13日电。

员和干部中也程度不同地产生了‘信仰危机’。这是客观存在，我们不承认、不正视不行。”^①看来，如何进一步加强苏联解体的研究和宣传，尤其是从信仰危机的视角探析苏联解体，从而更好地教育我国的党员、干部、群众依然是任重而道远的重大课题。虽然信仰危机现象在我国的出现、发展、蔓延只是存在于一定范围内，但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和回避。在此背景下，从信仰危机的视角探析苏联解体的原因、教训，对于加强和改进我国的信仰建设，逐步化解信仰危机现象，使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最大限度地减少曲折和弯路，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二 相关研究综述

目前，世界各国学者已出版的关于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研究专著、教材、论文等可谓汗牛充栋。仅关于苏联解体的历史类专题书籍就二十多万种，数百亿字，各学科的研究论文更是不计其数。在这些研究中，无论是西方国家、俄罗斯，还是我国，从信仰的视角来研究苏联解体尚不多见，但是立足于意识形态、文化体制、政治文化、思想教育等相关视角的研究比较丰富，现将相关研究概述如下。

（一）国外学者研究的文献综述

限于篇幅，本书主要阐述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学者的研究现状。西方国家的学者对苏联的共产主义信仰态势有着极其鲜明的“政治”立场、观察力和预见性。如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败在了意识形态上，败在了对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信念上。”^②西方学者对此的认识、研究与争论也较多，除去那些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进行恶毒攻击的言辞外，他们主要是侧重于苏联解体因素中“精英集团”的信仰、戈尔巴乔夫本人政治信仰、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的考察。

西方学者研究的第一个方面是，侧重于考察执政的“精英集团”的信仰变化，认为马克思主义信仰对苏联民众具有欺骗性、虚假性、脆弱性，是一种抚平平民百姓的政治技巧，而对于所谓“政治精英”事实上的影响相当有限。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是持此观点的代表性人物。他指出：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的内部——指的是10万人左右

①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5页。

② 转引自许志功《许志功讲学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48页。

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正是这个“精英集团”想实行资本主义，以便他们享有更大的权力，拥有更多的财富。^①他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想主义的革命者组成的，但到了80年代，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已经放弃共产主义，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这时，这批“精英”们就开始考虑实行什么样的改革方案对他们最有利。显然，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这样他们就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地增长，又能让子女合法地继承权力和财富。与大卫·科兹观点比较相似的还有美国学者杰瑞·F. 霍克的《1985~1991年俄罗斯的民主化与革命》^②、彼得·瑞得韦（Peter Reddaway）和狄米特·格林斯基（Dmitr Glinski）的《俄罗斯改革的悲剧：反对民主的市场布尔什维克主义》^③。

西方学者研究的第二个侧面是，更多地关注意识形态与戈尔巴乔夫本人政治信仰之间的相互关系。此种观点认为，以戈尔巴乔夫本人“更新社会主义”的政治信仰为背景的苏联意识形态在改革进程中具有更多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指出，意识形态作用在“改革”进程中不断被“边缘化”，不断地被削弱影响。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弗拉基米尔·什拉彭托赫认为，随着苏联经济改革的彻底失败，戈尔巴乔夫改变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牺牲了官方的意识形态，削弱了党和国家的巨大作用。这些使具有“恐怖和意识形态信仰”的苏联体系和苏联帝国不可能再保持下去了。^④美国学者约翰森·马切尔认为：“民主的中央集权制提供给苏联共产党以内聚力，但是也给予党的领导人大于意识形态的紊乱控制。戈尔巴乔夫实行了一套变化了的意识形态，降低了党的精髓的正统性，并且他建构的体系留给党在社会中一个缺乏明确功能性的角色。”^⑤

西方学者研究的第三个侧面是，从政治文化的视角综合考察上至苏联执政的精英集团下至普通民众的信仰状况。政治文化研究一般广泛地涉及一种

① [美] 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容湘、孟鸣歧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151~152页。

② Jerry F. Hough,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7.

③ Dmitr Glinski,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2001.

④ [美] 弗拉基米尔·什拉彭托赫：《苏联是一个正常的极权社会》，《共产主义研究和过渡政治学杂志》[英]第15卷第4期，1999年12月。转引自师小芹编写《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9期，第31~33页。

⑤ R. Judson Mitchell, Randall S. Arrington, "Gorbachev, ideology, and the fate of Soviet communism",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3 (2000): 457.

既定的政治制度与人们对其所持有的信仰和态度之间的关系。此研究侧面在苏俄建立后就有人开始涉及，因而起步较早，著述较多，曾一度占据苏联问题研究的主流地位。巴洪（Barghoorn）被西方公认为研究苏联文化的先驱，其著作《苏联政治》曾再版过三次，其中详细研究了苏联政治文化的历史模式、亚文化走向、精英的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化和交流过程。英国学者雷切尔·沃克在《震撼世界的六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怎样葬送了苏联》一书中专门探讨了苏联社会的政治文化情况。美国学者雷·特拉斯认为，苏联相当部分的民众之所以在苏联解体前放弃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们的思维中一直存在着两种“马克思主义”：一种是被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接受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另一种是对苏联统一的意识形态持否定态度者们所称颂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事实的发展是后一种马克思主义在民众们的思维中占了上风，这促使他们不再信任现政权。^① 还有的学者强调苏联民众中持不同政见者对普通民众的信仰影响，如美国学者理查德·派普斯认为：俄国知识分子是唯一一个有政治抱负的群体，它有着动员民众致力于推翻专制政体的光荣传统。而在苏联的一些学术机构中，持不同政见者们常常被迫做“自我批评”而不得不接受政府认为正确的观点，这本身就是让这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违反科学，使他们内心感到非常痛苦，而因此对这种体制产生厌倦。^② 此研究侧面关注的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年代是否形成了“一个民主的政治文化”，主要运用民意调查的方法，考察苏联改革时期公民的政治容忍度、对自由的评价、对独立媒体的支持度、对竞选制度的支持，或是考察民众对苏共、军队、苏维埃的感情与态度、政治效能、政治信任等。

综观上述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概况，他们提供了诸如政治文化、心理文化理论、精神分析理论等观察问题的新视角。但是，总体而言，在苏联未瓦解前美苏对抗的背景下，基于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美国的一些研究在其中提供思想理论支持、充当思想斗争的工具，直接服务于美国的对外战略，目的是破坏苏联的政治制度。因而，他们在研究苏联各个阶层思想或信仰变化时，大多所参照的是西方的经验，所依据的是西方民主政治理论。参照西方的经验，就是通过对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再反观苏联社会是否已形成类似“公民社会”、“公民文化”等态势，而“公民社会”则在

① Leslie Holmes, *Post-Communism: An Introduction*, UK: Polity Press, 1997, p. 27.

② Richard Pipes, *Communism: The Vanished Specter*, Norway: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0, 73.

马克思主义中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治世之道的基础，这就事先假定了苏联向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可能性；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中，共产主义一直就是不可能的“乌托邦”。如有人认为“由列宁所定义的‘社会主义’注定要灭亡，因为它是建立在对人性的错误假设的基础上”^①。不少西方学者从这种抽象的人性论出发，认为人性本恶，建筑在人人都有高尚的道德修养的理论假设之上的“共产主义大厦”是错误的，是没有前途的，其重点集中在对苏联各阶层人士如何认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所体现的价值、信念、态度等，故而不少研究歪曲甚至诋毁了灌输马列主义信仰的内涵与价值，缺乏对政治文化具体内容的客观、科学描述。此外，还有的研究是将信仰的变化作为苏联领导人个人传记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无可避免地以静止的观点看问题，主观性太强。因此，上述局限性也就限制了他们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与现实性。

就俄罗斯学者研究而言，俄罗斯各政党、派别和社会团体、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得出的结论差别较大。我国已出版的《前车之鉴——俄罗斯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的各种观点综述》^②一书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与总结，其中涵盖了苏联、俄罗斯主要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以及俄罗斯左翼、中派、右翼各政党等对苏联剧变的看法，其中对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问题也散见其中，在此不再赘述。此外，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出了比较有价值的思想和比较新颖的观点，以下是与本题题相关的三种有代表性观点。第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俄罗斯学者安德烈·克鲁申斯基认为，“人的因素”在苏联受到许多消极影响，最严重的是受到三次打击。第一次打击是希特勒强加于苏联的战争，导致了“逆向的自然选择”：死去大批坚强、勇敢和忠诚的人；第二次打击是赫鲁晓夫拙劣地开展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谴责，破坏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任，造成了思想上的真空，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得以乘虚而入；第三次打击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为党的精英阶层中的投机分子开辟了保持权力和个人升官发财的“可供选择”的道路。^③

① [美] 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吴乃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第758页。

② 李兴耕等编《前车之鉴——俄罗斯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的各种观点综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③ [俄] 安德烈·克鲁申斯基：《“人的因素”在苏联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崩溃中的作用》，辛庚译、靳辉明主编《社会主义的历史·理论·前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311页。

第二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俄罗斯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谢·卡拉-穆尔扎在其著作《论意识操纵》中，对苏联的解体原因进行了一次全面深入的文化审视和系统分析。他描述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苏联社会的文化核心和传统是如何在各种内外力量的作用下一步一步遭到破坏的，讨论了破坏的过程、手段、技巧和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专家们在其中所起的作用。^① 作者认为，对苏联社会“文化核心”进行“分子入侵”，使其遭受怀疑，然后再逐步清除苏联社会和社会体系的合法性，这就是苏联一步步走向解体的具体过程。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一过程已在异己思想范围内展开了。产生这种情况，有内部和外部的原因。从1985年起，这个过程则由苏共思想机器公开进行。而广大劳动群众，也跟在上层大人物的后面，完成了全社会“观点上的转变”。与此观点相类似的还有俄罗斯学者B. A. 利西奇金和Л. A. 谢列平，两人在合著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②一书中提出信息是一种新式武器，并详细论述了施加信息心理影响的方法，叙述了五十年反苏信息战（也叫冷战）的沧桑巨变，以及苏联人民深受的灾难；描述了苏联社会意识的变化，它使民众不是生活在现实世界，而是生活在外界灌输和建立的虚幻世界中。作者认为，苏联在这场信息心理战中失败了，其最终结果是导致了苏联解体。该书得出的结论是：信息武器是目前直接威胁人类的主要危险，它可以改变人的思想意识，迫使人们接受虚假的现实，在幻想的世界中生活，从而采取自我毁灭的行动。

第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苏联时期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现任俄罗斯国立大学教授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认为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崩溃”，有长时间的演进过程并进行了评析。他认为其中包含着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经典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这种马克思主义是曾在西方生活过、为数不多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熟悉的。第二阶段——马克思主义以列宁主义的形式传到俄国，此时，马克思主义适应了新时代的要求。它的文本被简化了。第三阶段——斯大林主义，此时，以列宁主义的形式为人们所熟知的东西，实际上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了苏联的条件。把这称为“斯大林主义”更为正确。考虑到千百万群众的状况，对它进行了极端的简单化——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第四阶段——后斯大林时代。第五阶

① [俄] 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宋嗣喜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② [俄] B. A. 利西奇金、Л. A. 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徐昌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